

民意何以汇聚： 1946年上海《文汇报》时局问题测验探析^{*}

陈宇晗

内容提要 1946年10月,上海《文汇报》副刊“读者的话”发起一次关于时局问题的民意测验,旨在征求读者对美军驻华和国共内战的看法。这次测验吸引了近两万人参与。《文汇报》秉持爱国立场,测验题目设计紧扣时局热点,测验结果明确表明:绝大多数参与者要求美军退出中国、国共停止内战。这次民意测验巩固和凝聚起反美军驻华、反内战的力量。民意的汇聚,不仅对国民党相关舆论宣传做出了有力反击,也对美国方面造成一定的舆论压力,还为中国共产党争取更广大民众的支持与认同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文汇报》 民意测验 新闻传播史

作者 陈宇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世纪20年代,随着西方社会学调查方法的传入,中国出现了大量民意调查和民意测验。^①这些调查和测验由不同的组织或个人开展,大多以报刊为媒介,征集特定群体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观点态度。时人对民意测验也抱有相当高的期望,将其视为“民主的工具”和行政当局的“指南针”。^②

在这些民意测验中,1946年10月上海《文汇报》举办的“时局问题测验”有其独特之处。第

* 感谢李世鹏、王艺纯等学友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本文曾提交第三届“中国近代史青年论坛”,承蒙与会专家及匿名评审专家指正,谨致谢忱!

① 有关民国时期民意测验的发展概况,可参看陈崇山《民意调查在中国》,《新闻研究资料》1989年第2期;范红芝《民国时期民意研究综述——基于民国期刊文献(1914—1949)的分析》,《新闻春秋》2013年第2期;杨勉、杨天宏《近代中国民意调查论略》,《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具体到民意测验的个案考察,项旋、周斌、杨程和杨天宏早期的研究多集中于关注测验过程及结果,例如项旋《1926年〈京报副刊〉“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探析》,《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6期;周斌《1928至1929年的反日会》,《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杨程《党意还是民意——上海〈民国日报〉上的民意测验(1928—1932)》,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2012年;杨天宏《密勒氏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分析》,《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近年来,相关研究呈增多态势。李世鹏、杨天宏等学者试图通过对比多次民意测验的结果来梳理历史发展线索,这推动民意测验的研究迈向更加深入和立体的层面。见李世鹏《社会期待与女性自觉——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意调查中的典范女性形象》,《妇女研究论丛》2019年第5期;杨天宏《军阀形象与军阀政治症结——基于北洋时期民意调查的分析与思考》,《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杨天宏、付天星《近代国人对苏俄的认知及其变化——基于民国时期民意调查的分析》,《四川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杨天宏:《近代中国的民调主旨与问卷设计分析》,《史学月刊》2022年第6期。稍显遗憾的是,目前的研究对《文汇报》时局问题测验鲜少论及,这与该测验庞大的样本量和广泛的影响力形成了强烈反差。

② 余日宣:《民主的工具——民意测验》,《沪江新闻》,1949年1月12日,第4版。

一,它依托副刊“读者的话”,在短短8天内共收到18907份答卷,如此庞大的样本数量在民国时期民意调查史和新闻传播史上均属罕见。第二,在近两万人参与的情况下,测验的最终结果呈现出民意高度一致的状态。第三,时局测验(亦称为“时事测验”)不同于普通的民意测验,它在问题的设计上主要基于时事热点。被冠以“时局测验”或“时事测验”的活动,从性质上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党政军等机构及学校在其内部举行的时事政治问题的测验,一般有明确的“标准答案”和正误之分,甚至会根据测验结果对测试者进行奖惩^①;另一类是借助报刊等大众媒体面向普通民众开展的有关时事问题的调查,通常也被称为“民意测验”,这是本文所关注的类型。本文拟以《文汇报》时局问题测验为切入点,考察其如何因应“美军退出中国”运动而开展,又如何在运动中发挥汇聚民意、宣传动员的作用。

一、时局测验的开展

1946年10月7日,《文汇报》副刊“读者的话”刊载一封署名为“岳虎”^②的读者来信,他自称是该报“长年读者”。在信的开头,他用极富感染力的口吻抛出几个问题:

为什么有血性有志气的中国人民,还不都站起来说话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致团结行动,把我们人民所发表的意见实现呢?

真要让万恶的内战,把全中国的精华、人才、财富,全都毁于两败俱伤、毫无意义的可诅咒的内战中吗?

真的我们甘心看着自己的同胞,就在自己的土地上,让外国军队辱骂、痛打、调戏,甚至打死了,视同草芥一样?

我们就眼睁睁的让祖国的天空、海洋、领土,充满着外国的飞机、兵舰和军队,而甘心做殖民地的奴隶吗?

随后,岳虎自问自答道:“不!我们绝不!我们要吼,我们要争,抛头颅,流鲜血,我们也绝不畏缩。”他的这番语言试图唤起每一位读者的共情。^③

进而,他提议《文汇报》开展一次调查,以彰显“人民意志”,并号召“志同道合的”“有血性的”、“死也‘骇不倒’的读者广泛参与,“千万别放过这发言的权利”。在问题设计上,岳虎提出了两个民众最为关心的时局问题并分别给出三个选项:

甲、关于美军驻华

- A. 我赞成美军驻华,多多益善;
- B. 我要求美军立即退出中国;

^① 如陈礼江《195个大学生时事测验的报告》,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第2编“文教事业卷”(四),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886—895页。

^② 有关“岳虎”的身份背景,目前尚无直接材料可资说明。然而,重庆《中央日报》曾刊载一篇署名同样为“岳虎”的文章,文中主要介绍税务专门学校的课程改革等相关问题。如果确系同一人,那么“岳虎”应当对教育界有所了解。参见岳虎《税专革新课程》,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8月8日,第5版。

^③ 本段及下两段引文均出自岳虎《两大时局问题测验,请全国读者踊跃发言!》,《文汇报》,1946年10月7日,第6版。原题目以(一)(二)(三)指代各选项,为便利论述改为A、B、C。

C. 我无所谓，美军驻不驻在中国，与我无关。

乙、关于内战

A. 我赞成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大打一下，分个高低；

B. 我以中国人民——中国主人翁之一的身份，命令国共双方的军政领袖和所有兵士，立即无条件的放下武器，停止一切战争；

C. 打也好，不打也好，与我无关。

岳虎在信件末尾，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主张：“赶快把内战之火扑灭，请美军早回。”《文汇报》编辑赞同岳虎的提议：“时局危急到了极点，除非人民愿意坐以待毙，是到了人人应该出来说话的时候了。”在两道题目的基础上，编辑又为测验制定了6条简约，规定测验对象“只要是中国的国民，不问男女老幼，不问职业，或有业无业，均可参加发言”，但须注明本人的性别、年龄和职业信息，以便统计。

测验开始后，大批读者积极参与，至10月10日，前4天便有三四千人以上。^① 测验原定截至10月12日，但为了使更多的外埠读者能参与其中，《文汇报》特意延期至15日。^② 最终参与者的数量远远超出报社的预计，因而专门选派15名工作人员负责整理收回的答卷。^③

一周后，10月23日《文汇报》“读者的话”栏目，辟出整整一个版面来公布测验结果。据统计，本次测验共收回9514件、18907份答卷。每一件中既有个人的，也有以家庭或团体为单位汇集在一起的答卷。某些件中所包含的答卷多至数百份，但都详列信息，“充分表明它们的正确性和真实性”。编辑们拆信、阅读、整理、分类、报数、统计，尽管手段落后，在计数上“很可能漏列”，但“绝不可能浮夸”。^④ 测验的最终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文汇报》时局测验答案统计结果

问题	甲、关于美军驻华			乙、关于内战		
	A. 赞成	B. 撤军	C. 无关	A. 赞成	B. 停战	C. 无关
人数	95	18716	96	246	18597	64
比重	0.50%	98.99%	0.51%	1.30%	98.36%	0.34%

资料来源：《时局测验答案揭晓》，《文汇报》，1946年10月23日，第6版。

最终结果，两道题目赞同B选项的人数均呈压倒性优势，选择A和C的参与者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位读者在答案中提出口号，被《文汇报》作为发布测验结果时的副标题使用：“不打老百姓，不打自己人。”编辑则感叹道，这样的结果反映出“人民渴望和平厌恨内战的情绪是如何迫切，意志是如何坚定而一致”，还补充说：“欺骗人民侮慢人民的结果势必自掘坟墓！”^⑤

除对两道题目的选项进行汇总外，报社工作人员还统计了测验参与者的年龄、性别、所在地、职业等个人信息。在16338名提供性别信息的参与者中，男女占比约为七三开，女性参与者近5000

① 《敬爱的读者，您参加了民意测验吗？》，《文汇报》，1946年10月10日，第11版。

② 《关于民意测验敬告读者》，《文汇报》，1946年10月13日，第6版。

③ 《本报民意测验参加者两万人》，《文汇报》，1946年10月21日，第3版。

④ 《关于时局测验的一个报告》，《文汇报》，1946年10月23日，第6版。

⑤ 《关于时局测验的一个报告》，《文汇报》，1946年10月23日，第6版。

人。在年龄段分布上,以青年人居多,剔除2531名年龄不明者,20岁以下约占1/3,20—30岁年龄段接近1/3,还有两成的参与者年龄为30—40岁。合计40岁以下的参与者超过85%,如此高的比例,充分体现出青年人对这两个议题的重视。这同样反映在参与者的具体职业分布情况上,学生(约37.40%)、工人(约16.85%)、职员(约11.82%)三者占比最高。地域分布以上海为主(约56.80%),周边的江浙皖地区也有不少读者参与(约37.87%),二者相加占总数的近95%,距离最远的参与者来自四川(51人)。^①

测验结果公布后,有读者投书对《文汇报》编辑表示祝贺,并感谢《文汇报》提供了一个“透气的洞”,使民众有“透出这一股不约而同的心声”的机会。^②还有无锡读者表示,“我相信,我全中国的真正公民,都是主张美军退出中国的”。^③《文汇报》之所以在此时举行关于美军驻华和国共内战问题的测验,与这一时期国内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

二、“美军退出中国”运动与反内战浪潮

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的阴霾笼罩着中华大地,美国政府以遣送日俘为由,派遣海军陆战队进入中国。反内战与反美军驻华的呼声从战争结束短短两三个月便已出现。1945年11月初,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篇文章,谴责驻华美军“不仅间接支持中国的内战,而且直接参加中国的内战”,要求其立即撤出中国。^④11月16日,内迁成都华西坝的燕京大学爆发由学生自治会发起的群众大会,200余名学生决议反对内战,并呼吁美方撤出在华美军。^⑤但随着1945年底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来华调停国共矛盾,中国共产党相应地调整了策略,停止公开批评,并对驻华美军保持相对克制甚至友善的态度,直至内战全面爆发。^⑥

1946年7月安平事件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展开宣传,批判驻华美军协助国民党军队运兵、占地、筹备物资,破坏国共和谈。而安平事件则被认为是美军“武装干涉中国内政”“侵占中国领土”的实证。^⑦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谈话时,公开表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⑧因此,由美国居中调处、国共双方进行和平谈判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驻华美军与中国民众之间的矛盾,及其作为国民党政权发动内战“帮凶”的形象,成为中国共产党舆论宣传与国共论争的焦点,集中体现在1946年9—10月的“美军退出中国”运动。

1946年9月中旬,偏向共产党阵营的美国国会“争取和平委员会”和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共同发起“美军退出中国周”。活动计划于9月22—28日在全美35个主要城市开展,以其作为10月18日在旧金山召开的“中国及远东大会”的前奏。^⑨在报道此消息的同一天,《文汇报》副刊“读者

^① 《时局测验答案揭晓》,《文汇报》,1946年10月23日,第6版。

^② 王裕仁:《时局测验百分比》,《文汇报》,1946年10月28日,第6版。

^③ 朱学:《来自无锡的一片忧时语》,《文汇报》,1946年10月20日,第6版。

^④ 《美军应立即停止参加中国内战》,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1月6日,第2版。

^⑤ 《有关国民党压制成都燕京大学展开反内战撤退美军的学生运动函令》(1945年11—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政治”(4),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34—335页。

^⑥ 孙岩:《战后初期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反对美军驻华的斗争》,《国际政治研究》1993年第2期,第100—102页。

^⑦ 左承颖、杨雨青:《何去何从:安平事件后国共美三方对驻华美军的因应》,《军事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第84—85页。

^⑧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5页。

^⑨ 《美国“争取和平”团体将举行“退出中国周”》,《文汇报》,1946年9月11日,第1版。

的话”刊载一封署名为“爱好自由的读者”的来信，信中讲述了他目睹几个美国海军士兵酒后殴打中国人的经过。被打者鲜血直流，打人者却唱着歌曲扬长而去。^①此后，9月13日“读者的话”又刊登数封读者来信，内容均为抗议美军暴行。信前编者的附言明确“美军退出中国”与国共内战之间的关联性：“在今日，中国人民最大的课题莫过于遏制内战；而遏制内战，首先应当使美军退出中国，停止拨火。”^②因此，当下的宣传重点被确定为“美军退出中国”。在此基础上，《文汇报》“读者的话”借读者来信呼吁国内民众“起来响应这正义的号召”，“用我们的声音，用我们的笔杆，用我们的行动，用我们所有的一切力量来推进这一运动的成功”。^③

上海的“美军退出中国周”活动定于9月23日开始，考虑到时差，中美的活动几乎同时进行。上海中国人民促进世界和平会、经济事业协进会、民主建国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国际人民保障会、全国文艺协会、中国妇女联谊会上海分会、妇女节制会、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等10家团体共同发起这一活动。活动的形式以茶会为主，计划分别招待外国记者和工商界人士，中国新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和妇女界人士，向他们发表主张和看法。^④在为期一周的活动中，张炯伯、罗隆基、章乃器、罗叔章、胡子婴、刘王立明、王绍鉴、黄艺昌、郭沫若、翦伯赞、马叙伦、茅盾、田汉、丁聪、叶圣陶、史良等民主人士纷纷出席并发言，对外公布了多项决议。工商界、妇女界等人士大声疾呼：“必须停止内战”“美军必须撤出中国！”在9月27日举行的文化教育界座谈会上，茅盾提出：“我们要以农民和小市民为对象，动员所有的作家、漫画家、音乐家、戏剧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达到上述的任务！”马叙伦补充道：“我们应该向世界宣传，把联合国安理会当作我们的对象。”^⑤因此，发动基层群众和争取国际舆论成为“美军退出中国周”活动所确立的目标。

发生在“美军退出中国周”前夜的“臧大二子案”^⑥成为重要的助燃剂。9月22日晚，上海人力车夫臧大二子与美军水兵爱德华·饶得立克(Edward Roderick)发生冲突，被后者挥拳猛击，随后不治身亡。《文汇报》对此事件给予高度关注。9月24日，该报以“编者的话”和一篇副标题为《蛮横的美国兵，廉价的中国血！》的文章进行报道。^⑦随后几日，《文汇报》持续关注这一事件。记者夏其言访问了40多名人力车夫，整理出他们对美国兵的不满与控诉；“读者的话”代为接收部分给臧大二子遗属的捐款；“编者的话”短评不断追问事件的后续处置。^⑧据统计，《文汇报》对该事件相关的新闻报道共有43篇之多，是“所做报道最多的一个媒体”。^⑨经过几日的发酵，9月28日，臧

① 爱好自由的读者：《廉价的中国血》，《文汇报》，1946年9月11日，第6版。

② 《抗议美军在华暴行，响应美国人民的“退出中国运动”》，《文汇报》，1946年9月13日，第6版。

③ 魏芳：《响应退出中国周，敬告驻华盟军》，《文汇报》，1946年9月18日，第6版。此外，“读者的话”副刊9月中旬刊发的类似文章还有：蒋汉民《内战一日不停，外侮一日不止》，《文汇报》，1946年9月14日，第6版；史季平《论美军的态度》，《文汇报》，1946年9月17日，第6版。

④ 《“美军退出中国周”工商协会等十三团体举办》，上海《大公报》，1946年9月23日，第5版。不同媒体对十团体的具体说法有所差异，此处参考《“美军退出中国周”》，上海《大公报》，1946年9月24日，第5版。虽然最初的报道中有“十三团体”的说法，但各家媒体很快便趋于一致，以“十团体”泛指。

⑤ 陈明申：《响应“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在上海》，《民主》（桂林版）第28期，1946年10月18日，第7—9页。

⑥ “臧大二子”原名臧咬成，又称“臧大咬子”。见张爱平选编《臧大二子事件中美交涉档案选辑》，《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2期，第21页。

⑦ 《编者的话·美军又行凶》，《文汇报》，1946年9月24日，第1版；《美军又一凶案 酗酒殴死车夫》，《文汇报》，1946年9月24日，第3版。“廉价的中国血”最初来自前述“爱好自由的读者”，他在接受美国宪兵询问时说出了“The blood of Chinese is cheap”。此后《文汇报》在对臧大二子案的报道中再次使用这一说法。见爱好自由的读者《廉价的中国血》，《文汇报》，1946年9月11日，第6版。

⑧ 夏其言：《人力车夫对美军的控诉》，《文汇报》，1946年9月28日，第3版；《慰问臧大二子遗属 读者捐款三万七千》，《文汇报》，1946年10月10日，第11版；《编者的话·下文何在》，《文汇报》，1946年9月29日，第1版。

⑨ 孙学丽：《1946年上海臧大二子案述论》，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6年，第26页。

大二子之弟臧海成突然出现在十团体举行的“美军退出中国周”活动现场，声称“特为哥哥被美军打死伸冤而来”。在会场内，臧海成详细报告其兄惨死的经过，“感动了所有的座中人”。会议当场决定组织“臧大二子惨死后援会”，除提供法律帮助外，还发动募捐与舆论声援。^①“美军退出中国周”的宣传内容包括抗议美军在华的暴行^②，因而，臧大二子案便成为“美军退出中国周”活动活生生且有说服力的依据。

“美军退出中国周”的风波从中、美的民间蔓延至联合国安理会的会场，中、美、苏三方为此展开激烈交锋。^③就在上海举行首日活动（9月23日）的数小时后，苏联代表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提请安理会注意“有关联合国会员国武装部队留驻非敌国境内”所引起的“国际和国内情况复杂化”，以及对民众带来的“不断增长的恐惧”。葛罗米柯在发言中首先强调中国的局势，称中国“所发生的事件表明，美国军队继续留驻中国是值得予以最严重的注意的”，美军驻华是“对现在中国正在从事斗争的两派之一的积极支持，以及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已引起中国社会各界人士的抗议。^④在次日的会议上，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夏晋麟反驳苏方观点，“确告理事会美军驻华从未干涉中国之内政”，也不会“引起国际摩擦或惹起争端”。至于美军何时撤离，夏晋麟表示，这“纯属敝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决定之事”，暗指苏方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代表也回应称，苏联政府的指责“至为严重”，事前未经外交途径而直接向安理会提出，“实属至可遗憾”。^⑤苏联在安理会的行动是有计划的。9月24日，即葛罗米柯在安理会发言的次日，苏联国家通讯社塔斯社公布斯大林接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记者亚历山大·威尔斯（Alexander Werth）采访的实录。当威尔斯问到：“你是否相信尽早撤出全部驻华美军是实现未来和平的必要条件？”斯大林的回答直截了当：“是的，我相信。”^⑥

尽管苏联代表在安理会的提案最终被否决^⑦，但是按照时任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亚历山大·卡多根（Alexander Cadogan，时译为贾德干）的说法，提案背后的“宣传性”与“政治作用”才是关键。^⑧苏联的表态第一时间传到中国。^⑨在国内民主人士掀起运动、苏联方面公开表态支持的背景下，中共中央下发文件，指示将“美军退出中国”确定为“当前的宣传口号”，“打破和平攻势之欺骗”，并要求各地积极响应，通过座谈会、群众大会、“做文章拥护”与“访问名人发表谈话”等方式进行。^⑩

^① 《臧大二子惨死，其弟呼吁伸冤》，《文汇报》，1946年9月29日，第3版。臧大二子案的审理历经数年，直至1948年初，爱德华·饶得立克最终被美国海军军事法庭判决无罪，这令上海地方法院“殊属遗憾”。见张爱平选编《臧大二子事件中美交涉档案选辑》，《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2期，第26页。

^② 《抗议美军在华暴行，响应美国人民的“退出中国运动”》，《文汇报》，1946年9月13日，第6版。

^③ 过往的研究主要立足于革命史的视角，对国、共、美、苏四方的互动关注略显不足。例如雷云峰主编《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310页；刘明达、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6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133页。

^④ 葛罗米柯：《列举事实说明苏联提出有关联合国会员国武装部队留驻非敌国境内问题的建议的理由》（1946年9月23日），世界知识社编：《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发言选集》第一集，世界知识社1955年版，第54—56页。

^⑤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72次会议）》（1946年9月24日），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G9/009/53/pdf/NG900953.pdf>, 2020年8月10日。

^⑥ “Mr. Stalin on Friendship with the West,” *The Times*, September 25, 1946, p. 4.

^⑦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72次会议）》（1946年9月24日），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G9/009/53/pdf/NG900953.pdf>, 2020年8月10日。当日参与投票的共计11个国家，赞成者有苏联和波兰两国，澳大利亚、巴西、中国、墨西哥、荷兰、英国和美国投了反对票，埃及和法国弃权。

^⑧ 《英美军驻在非敌国，葛罗米柯提出质询》，南京《中央日报》，1946年9月25日，第3版。

^⑨ 《苏联要求安理会注意中国局势》，《侨声报》，1946年9月25日，第1版。

^⑩ 《中央关于开展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周的指示》（1946年9月2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99—300页。

于是,延安、哈尔滨、齐齐哈尔、苏皖边区、晋察冀边区、冀鲁豫边区等地的“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在10月初纷纷展开^①,新加坡、香港等地海外华侨也积极响应。^②为了配合运动,各地印刷出版了宣传动员的小册子,还编写歌曲《要求撤退美国兵》和京韵大鼓词等,力求深入基层群众。^③

针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方面的行动,驻美大使顾维钧向蒋介石报告称,美军的撤出必然导致苏联势力的深入,因此他建议“应拥护美政府之政策,主张美军继续留华”。^④蒋介石持类似的看法,他在9月底的“本月反省录”中分析道,苏联鉴于当前的国际形势,“近惟以指使中共积极反美驱马(指马歇尔),撤退美国驻华之陆战队”。他认为,“俄之内部弱矣,亦日渐暴露,乃至不可掩饰之时矣”。^⑤基于上述分析,国民政府方面的各界人士纷纷鼓吹美军驻华的必要性与合法性。外交部次长刘锴在葛罗米柯发言后作出声明,坚称美军驻华是其“为中国战区同盟国一员之义务”,主要工作并非协助国民党军备战,而是“协助遣送日本人民”。^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驻美大使顾维钧、立法院长孙科等人先后通过接受采访或发表谈话表达类似的主张。^⑦外交界、法学界专家王宠惠、颜惠庆、左舜生、郑毓秀在接受国民党中央社采访时,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对美军驻华的事实进行美化。^⑧

总体而言,针对中国共产党及国内民主人士发起的“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国民党方面未积极做出回应,甚至并不认同相关诉求。《立报》“社评”称这些人士“小题大做”,因为“中国的问题固然不会因美军的退出中国而得到妥当的解决,而世界第三次大战的危机,尤其不会因美军退出中国而消除一切国际间的矛盾”。^⑨某小报更是讥讽这些宣传活动简直就像“节目演出”,某些民主人士发言的语气,“似乎国家大局全是他一人掌握”。^⑩基于此,国民党当局采取“冷处理”的策略加以应对。这样的做法或许仿效美国政府处理国内撤军活动的态度,“各方对之未加重视”。^⑪其目的是平息国内的舆论,避免中国共产党就此展开“舆论攻势”。^⑫在舆论宣传上,国民党当局不

① 檀汶:《解放区千百万人民要求美军退出中国》,《群众》第13卷第2期,1946年10月27日。

② 据说有超过3万人参加了新加坡华侨致杜鲁门的请愿书联署。Telegram from Josselyn to Amembassy Nanking, October 28, 1946, Records of the Marshall Mission Relating to Political Affairs, Embassy Vol. 9, National Archives, General George C.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1945–1947, Reel 19:0001; 黄朗《南国的吼声》,《文汇报》,1946年11月4日,第6版。

③ 《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华中新华日报社1946年版;雷云峰主编:《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第310页;挺军编:《大鼓词:要求美军退出中国》,出版者与出版年不详。

④ 《驻美大使顾维钧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为电呈美左倾分子发起运动主张撤退驻华美军等情》(1946年9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66220-00010-014。

⑤ 《蒋中正日记》,1946年9月30日,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8册,台北,“国史馆”、中正纪念堂、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2015年版,第498页。

⑥ 《美军驻华经我同意,任务将完成数量续减中》,南京《中央日报》,1946年9月26日,第2版。

⑦ 《美军应邀驻华实能促成和平》,南京《中央日报》,1946年9月29日,第2版;《美军驻华任务,中国人民均了解》,南京《中央日报》,1946年10月5日,第3版;《孙院长发表谈话》,南京《中央日报》,1946年10月9日,第2版。

⑧ 《外交法学界耆宿谈美军驻华问题》,南京《中央日报》,1946年9月30日,第2版。

⑨ 《论美军退出中国周运动》,《立报》,1946年9月26日,第2版。1946年8月中旬,《立报》由时任国民政府社会部组织训练司司长的陆京士接任社长,改组为一家官方工人报纸。见李时新:《1946年上海〈立报〉改组探因——澄清〈立报〉晚期的一段史实》,《新闻知识》2011年第12期,第88页。

⑩ 洛德:《所谓“美军退出中国周”,精采节目开始表演》,《罗宾汉》,1946年9月25日,第1版。

⑪ 《驻美大使顾维钧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为电呈美左倾分子发起运动主张撤退驻华美军等情》(1946年9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66220-00010-014。

⑫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这一时期曾向各省党部下发文件,针对“奸伪份[分]子现极力利用”驻华美军“与市民发生冲突情事”“煽动风潮”,要求各地严加防范,“如发生此类事件应尽速调解处理”,“勿使扩大,以免为奸人利用”。参见《中国国民党湖北省武昌市执行委员会关于严密防范奸伪分子利用美军与市民冲突煽动风潮的代电》(1946年11月6日),湖北省档案馆藏,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档案,LS022-001-0177-0017。

仅把相关论述的重点放在强调美军驻华的合法性上,还倒打一耙,将美军迟迟未能完成“遣送敌侨敌俘返国以及树立中国国内和平秩序”的原因归咎于“共党的阻挠”。^①这样的做法,显然令广大民众和民主人士感到不满。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的支持下,动员国内外多方力量,深入基层群众开展舆论宣传,致力于使相关议题持续处于舆论焦点,并进一步汇聚和巩固反内战与反美军驻华的民意。《文汇报》时局测验正是因应这种形势发起和进行的。岳虎也明白这一点,他希望通过此次测验打破国民党当局制造的舆论假象。^②

三、《文汇报》的言论路线

社会各界对国共内战和美军驻华这两大时局热点议题给予广泛关注。事实上,这些分散的个人观点,唯有透过载体以某种形式才能得以彰显,进而汇聚为更明确的民意。在此过程中,《文汇报》副刊“读者的话”及时局问题测验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汇报》创刊于“孤岛”时期的上海,创刊伊始即确立“以宣传抗战、宣传爱国主义为言论方针”,“坚决反对侵略,对汉奸声讨毫不留情”。^③然而,短短一年多后,《文汇报》便由于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被迫停刊。^④战后,《文汇报》在上海复刊。1946年5月,徐铸成回归《文汇报》任“总主笔”,他在5月1日“社评”中,重新明确该报作为“民间报”的立场:主张民主,“反对一切独裁、垄断、剥削及违反自由民主的现象”,使《文汇报》成为“民众的喉舌”和“民众的先驱”;还强调,“民意的具体反映在新闻纸”,“报纸应该是人民最有力的武器”。^⑤秉持着这样的办报立场,徐铸成接手后的《文汇报》销量不断攀升,成为仅次于《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的上海第四大报。^⑥因而,《文汇报》在上海拥有相对稳定的读者受众群,舆论具有一定影响力。

负责开展时局测验的“读者的话”,创办于1946年1月,由柯灵任主编,是该时期《文汇报》唯一“逐日刊登”的副刊。^⑦刊头的四句话体现了柯灵对这个新栏目的设想:“有话大家来说,有事大家商量。不论男女老少,人人可以投稿。”因此,栏目以刊载读者来信为主,“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市井琐屑”,并附以编者的短评。来信内容包罗万象,尤其是各地民众对社会现实的揭发与控诉,使“读者的话”成为“一个长期的,公开揭露、控诉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陈诉箱’”。^⑧

徐铸成、柯灵等人塑造了这一时期《文汇报》鲜明的言论立场。徐铸成1946年自《大公报》出走《文汇报》,一方面是由于其先前在《文汇报》的经历及同总经理严宝礼的私交,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对于《大公报》“无权冒险”,而在《文汇报》则可以“去试试”。^⑨这种“冒险”和“试试”更多指言论立场与话语风格。相较之下,《大公报》的言论风格趋向中间偏右,而《文汇报》则倾向于中间偏

① 《反美外交攻势的内幕》,《申报》,1946年9月25日,第2版。

② 岳虎:《两大时局问题测验,请全国读者踊跃发言!》,《文汇报》,1946年10月7日,第6版。

③ 《徐铸成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66—67页。

④ 周立华:《“孤岛”时期的〈文汇报〉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102页。

⑤ 《我们的自勉》,《文汇报》,1946年5月1日,第1版。

⑥ 《徐铸成回忆录》,第114页。

⑦ 《本报副刊周刊》,《文汇报》,1946年9月3日,第8版。

⑧ 黄立文:《大胆、泼辣,喊出人们的心声——柯灵主编的〈读者的话〉》,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编:《从风雨中走来》,文汇出版社1993年版,第300、302页。

⑨ 《徐铸成回忆录》,第110页。

左的立场。^①柯灵早年家境贫寒。193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来到上海投身电影业。据他所言,此时的电影界“正是左翼文化运动勃兴的时候”,他有机会“近在身边”,“碰上了党的‘电影小组’的成立”,如同“在云横雾塞中逐渐看到了对岸的青山”。^②正是这一时期,柯灵结识夏衍、沈西苓、石凌鹤、王尘无、郑伯奇等中共党员和左翼知识分子,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加入左翼剧联的“影评小组”。^③抗战全面爆发后,1938年2月,柯灵在新创刊的《文汇报》担任文艺性副刊“世纪风”的主编。“世纪风”得到“党和进步文艺界的大力支持”,不仅影响了广大群众,也为作家提供了“广阔和灵活的活动阵地”。《文汇报》停刊后,他坚持创作,还投身左翼戏剧事业,曾因撰写抗日文章先后两次被日本宪兵队抓去审讯。^④抗战胜利后,柯灵不仅创办政治性期刊《周报》,而且在复刊的《文汇报》开辟“读者的话”,还积极参加民主斗争,成立民主促进会,并担任理事。在这其中,“读者的话”对柯灵有非同寻常的含义,被其视为编辑生涯中“最为愉快和难忘”的经历。^⑤

复刊后的《文汇报》由于坚持群众立场、秉持爱国路线,得到中国共产党方面的重视。周恩来给予高度关注,他“看得十分仔细”,“记得起一些新闻、通讯和评论的内容”,甚至还记得“读者的话”的某些内容。^⑥中国共产党与《文汇报》在资金和人员方面均有一定的关联。在资金上,《文汇报》和严宝礼在1946年接受过中国共产党的支援。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打压,《文汇报》在白报纸的配给上遭到歧视和压制,印报成本大大增加。正当此时,会计袁鸿庆从周公馆取回一张1000块银洋铺的支票,有效缓解了资金周转的紧张局面。严宝礼感叹道:“真是雪中送炭啊!”^⑦人员方面,徐铸成在回归后重组了一支60余人的编辑部,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徐才得知,这其中竟有多达十六七名中共地下党员。^⑧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对《文汇报》的新闻立场产生着影响,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重要舆论阵地,肩负起争取国统区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的使命。周恩来曾对徐铸成直言,《文汇报》作为“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报纸”,有着与解放区报纸不同的任务、对象,“这也是自然的分工嘛”。^⑨例如,在臧大二子案的报道中,身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的副总主笔陈虞孙安排同为地下党员的记者夏其言,“最好是到广大人力车夫中去深入采访,写个有份量的综合报道,而且尽早写出来,以配合当前如火如荼的反对美国军队留驻中国的群众运动”。而这篇“生动具体、具有极强说服力”的报道见报后,“读者反映强烈,社会影响较大”,人力车夫互助会等组织专门向《文汇报》表示感激。^⑩因此,《文汇报》在这一时期承担着配合中国共产党宣传“美军退出中国”运动的任务,成为了汇聚民意的载体。

由于《文汇报》及“读者的话”副刊的言论路线,国民党当局对其屡屡发难。1946年5月起,“读者的话”刊载大量读者来信,反对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推行“警管区”制度。警察局方面则以7

^① 徐铸成:《一位隐名的来访者——忆“一二·一”惨案揭露经过》,《报海旧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98页。

^② 柯灵:《我的人生旅行——〈柯灵电影剧本选集〉序言》,《电影艺术》1980年第11期,第39页。

^③ 周斌:《论柯灵的电影剧本创作——纪念柯灵百年诞辰》,《上海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第80页。

^④ 柯灵:《上海抗战期间的文化堡垒》,《党史资料丛刊》1985年第2辑,第118、123—124、126—127页。

^⑤ 柯灵:《煮字生涯》,“序言”,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⑥ 黄立文:《梅园采访杂记》,《从风雨中走来》,第153页。

^⑦ 任持平:《我的外公严宝礼》,《世纪》2010年第6期,第13页。

^⑧ 徐铸成:《一个志同道合的战斗集体》,《报海旧闻》,第404页。亦有一种说法为22名,但未说明具体依据。参见芳菲《同城两报——1946、1947年〈大公报〉〈文汇报〉之比较》,《过去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6页。

^⑨ 徐铸成:《周恩来同志对〈文汇报〉的关怀》,《报海旧闻》,第409页。

^⑩ 夏其言:《亲切的教诲》,《文汇报》,1995年2月7日,第7版。“有份量的综合报道”最终在“美军退出中国周”结束前刊发,即前述夏其言《人力车夫对美军的控诉》,《文汇报》,1946年9月28日,第3版。

月12日两封读者来信为借口，处罚整个《文汇报》停刊7天。然而，停刊期间的《文汇报》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同情，多家报纸甚至外文报刊都对国民党当局的做法提出批评。^①沪上一家名为《海风》的周报评价《文汇报》“恒站在民主同盟阵线上，针砭时局”，被处停刊“可谓不幸极矣”。^②1946年底，上海市社会局将该报定性为“言论左倾，偏向于中共”，并且“以本党（指中国国民党）为攻击对象，对本局施政多有不利之批评”，还认为“读者的话”“系由左倾作家柯灵主编，常有挑拨群众攻击政府之言论及赤化宣传”。^③上海市社会局做出这样的判断，或许还与同一时期蒋介石的言论有关。1946年12月6日，蒋在例行的总理纪念周活动中面向国民大会代表发表演讲，开篇便怒斥《文汇报》“与共产党沆瀣一气”。^④作为“广大蒋管区内的一盏明灯”的《文汇报》已成为国民党当局所不能容忍的对象，在先后三次企图收买均被徐铸成明确拒绝的情况下，1947年5月下旬，上海《文汇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⑤

《文汇报》及“读者的话”提供了一个平台，民众对于国共内战和美军驻华的厌恶与不满可以借此充分抒发。岳虎的来信便是一例。而岳虎号召发起的时局问题测验，则让更多民众以相对低的门槛直截了当表达自己的看法。

岳虎所设计的测验题目仅有两道，每道题目也只给出三个选项。两道题目的A和B选项代表两个对立的极端。A选项倾向于国民党当局的立场，B选项中“以中国人民——中国主人翁之一的身份”等措辞充满道德感、正义感和使命感，而C选项的“与我无关（干）”代表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文汇报》编辑也承认，这样的设计“显然不是缜密思考的结果”^⑥，但却更有利于民众的参与与信息的传播。可资对照的是发起时间更早的针对妇女界的时事测验。1946年9月27日，上海十团体响应“美军退出中国周”的活动进行至第5天，当日主题为妇女界座谈会，会上决定举行一次面向妇女界的时事测验。测验的开展形式以妇女团体会员分发问卷为主，同时分送几家报纸的妇女副刊刊登。测验共拟定多达8道题目，其中包括“为什么内战会打得这样剧烈？”“你认为什么是停止内战解决国内局势最好的途径？”“你觉得驻华美军目前究竟在做什么？”“你对于美军凌辱中国人民的暴行有什么意见？”“你对于美军退出中国问题的意见怎样？”等。每道题目在给出若干选项的同时允许自写意见。相较之下，妇女界时事测验的设计更为开放，还存在深度讨论的空间。但以效果论，由于测验题量大、调查方式多元，因而耗时一个多月才完成，错过了宣传“美军退出中国”运动的最佳时机；且问题设置过于复杂，参与门槛较高，该测验仅2000余人参与。^⑦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来看，明显逊于《文汇报》时局问题测验。

因此，虽然《文汇报》的主要读者群体为“高雅的知识分子”^⑧，上海市社会局也承认该报在“文

^① 柯灵：《与国民党警察局一面对面的斗争——文汇报被迫停刊七日前后》，《从风雨中走来》，第77—80页。20世纪80年代初，柯灵在回忆他编辑“读者的话”过程中最难忘的事情时，仍对反对“警管区制”一事记忆犹新。参见陈钦源《柯灵和〈读者的话〉》，文汇报报史编辑室编《在曲折中行进》，文汇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② 怡红：《胜利后新闻界不幸事件》，《海风》，1946年7月27日，第10版。

^③ 柯灵：《煮字生涯》，“序言”，第5页。

^④ 蒋介石：《本党对国民大会中争执诸点的意见》（1946年12月6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1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476页。

^⑤ 《徐铸成回忆录》，第113、119页；徐铸成：《一个志同道合的战斗集体》，《报海旧闻》，第405页。

^⑥ 《关于时局测验的一个报告》，《文汇报》，1946年10月23日，第6版。

^⑦ 《上海妇女界时事测验报告，二千四百个妇女对时局的意见》，《文汇报》，1946年11月3日，第8版。

^⑧ 董鼎山：《两个名字》，《留美五十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96页。

化、工人、知识界之读者颇多”^①，但时局问题测验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这一群体。在公布结果之际，“读者的话”还登载了一个六口之家寄来的答卷，其中年长者已75岁高龄，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职业包括家务、教师、职员、医生等。他们在化名KM的家人的执笔下，完成了两道题目的作答，并以画押或签名证明身份，而KM则是一名26岁的教师。可以推断，作为《文汇报》读者的他，看到时局测验的消息后，便对家中的老、中、青、幼四代人进行了测验。在最终收到的答卷中，有不少“读者全家参加测验”，因此，时局测验的参与者远超《文汇报》固有的受众群体。一些“根本不是本报读者”的主妇、佣人、车夫等群体，“也都对当前时局发表了他们朴素的意见”。据报社统计，测验参与者的身份甚至多达150余种。^②他们的踊跃参与，回应了岳虎“大局日糟，人民益危，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千万别放过这发言的权利”，“这只是我一个人的声音吗？”^③之类的号召。最终，时局测验压倒性的结果，将个体观点汇聚，并上升为主流民意，以数字的形式予以直观展现。

四、时局测验的舆论效果

在时局测验结果公布后，有读者高呼：“假使世界上有所谓‘民主’的话，这就是民主！这就是民意！”^④那么，《文汇报》的时局问题测验究竟产生了怎样的舆论效果呢？

最为直接的是，此次测验巩固和凝聚了反美军驻华、反内战的力量。1946年10月24日，即测验结果公布的次日，《文汇报》发表“社评”，向国共双方，尤其是国民党当局呼吁，“想想国民经济严重的情形，更顾念到全国人民目前的死活，为后世子孙多多造福，万勿要为了党派的私利，而做了人民的罪人，做了历史的罪人！”^⑤

在测验前后，一些读者的反馈纷纷呈现在《文汇报》。测验刚刚开始，青年会中学一位老师对高三年级的同学进行简单测验，超过七成的同学赞成内战立刻停止。该老师感叹道：“赞成和平的多，和平胜利了！”^⑥曾在《清宫外史》中饰演光绪皇帝的演员耿震也发表意见称，如果“内战停止、美军撤退”，他们“情愿每天加演日场”。^⑦还有读者投书，呼吁政府当局看看“国人的公意”，听听“人民的声音”：

老爷们喜于内战，老百姓欢迎和平，政府既然不肯接受民意，他们自己临阵去拼命吧。你们要争权夺利，不要再利用老百姓做牺牲品了。反对征兵如果违国法，我们要求和平，情愿犯国法而死，不愿打自己人当炮灰而亡。^⑧

1946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恢复征粮与征兵，这进一步激起了民众对内战的厌恶。^⑨各地

① 柯灵：《煮字生涯》，“序言”，第5页。

② 《关于时局测验的一个报告》，《文汇报》，1946年10月23日，第6版。

③ 岳虎：《两大时局问题测验，请全国读者踊跃发言！》，《文汇报》，1946年10月7日，第6版。

④ 王裕仁：《时局测验百分比》，《文汇报》，1946年10月28日，第6版。

⑤ 《为人民想想》，《文汇报》，1946年10月24日，第2版。

⑥ 青年会中学高三学术股：《和平胜利了：民意测验的第一个报告》，《文汇报》，1946年10月9日，第6版。

⑦ 《文艺短波》，《文汇报》，1946年10月14日，第7版。

⑧ 谢荣耀：《剩有红颜白发在，留与中华作主人？》，《文汇报》，1946年10月27日，第6版。

⑨ 《彭学沛答外记者》，《文汇报》，1946年10月17日，第1版；许纯俊、周士心：《反对征兵！老百姓要的是和平》，《文汇报》，1946年10月18日，第6版；《一叠连声反对征兵》，《文汇报》，1946年10月26日，第6版。

因反对征兵而发生的惨剧也屡屡见诸报端。^① 基于前期的宣传,迫使美军尽早退出中国被视为实现停战的先决条件,因此便形成了对内反内战、对外反美军驻华的双线并行的舆论格局。

10月中旬,《文汇报》的时局测验尚处于问卷整理与统计阶段,驻沪的外国媒体包括《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塔斯社等均派记者前来参观。^② 而当测验结果公布后,多家报刊纷纷转载和报道。其中,英文媒体《大陆报》(The China Press)、上海的《联合日报晚刊》、重庆的《新华日报》、延安的《解放日报》、长春的《前进报》以及山东的《大众日报》《胶东大众》等都给予高度关注。^③ 《新华日报》以大号字体概括标题为“人民不要战争要和平”,《解放日报》则特别突出“十一省复信一万八千余件,百分之九十九要美军离华”,进一步凸显测验结果的民意取向。

在这些报刊的推动下,《文汇报》时局测验的影响力得以进一步扩大。测验所汇聚的反美军驻华与反内战的民意,不仅为深入开展“美军退出中国”运动注入强大动力,也为中国共产党争取更广泛的民众支持与认同奠定了基础。同时,《文汇报》通过测验结果发起了更有针对性的舆论宣传,尤其是对选择内战“与我无干”(即问题乙的C选项)的参与者,提出直接而鲜明的呼吁:“国家既然是老百姓的,当少数人想把国家的命运推到一个绝境去的时候,怎么再能抱着‘与我无干’的态度?”^④ 这样的话语,不仅展现出《文汇报》等报刊舆论在汇聚民意中的重要作用,也尝试唤起“中间派”对国家命运的责任感,推动更多人站到反对内战的立场上来。因此,测验结果不仅是民意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民心所向,更是动员民众的重要契机。

如果将时局测验置于国共内战的背景下,则可看出双方所展开的舆论博弈。国共内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占据战场上的相对优势。1946年6月,国民政府应马歇尔的强烈要求,与中国共产党达成了东北停战协议。停战期间,朝阳当地的官方报纸《新热河报》对内战问题进行“民意测验”,其中3280人主张国民党军应恢复作战,只有28人赞同继续进行和平谈判,前者约占99.15%。^⑤ 6月17日,北平出版的国民党官方报《华北日报》刊登读者查惠民的来信,他希望该报发起一个时局测验,所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停战期满后“仍然得不到全面协议,你认为政府应该怎样好?”仅有“强力制乱”和“继续协商”两个选项。6月30日,该报公布最终统计结果,参与者共计50891人,其中主张“戡乱”者高达99.98%,仅9人有不同意见。^⑥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国民党当局利用这些“民意”数字主要目的有二:其一是对中国共产党方面进行恫吓,标榜其如果采取进一步“戡乱”行动所具有的合法性;其二是将无法达成全面协议的责任归咎于中国共产党,在舆论中极力渲染“退让”与“容忍”的形象。7月1日《华北日报》的“社论”抨击中国共产党“花样翻新,得寸进尺”;国民党方面则“以最大的容忍,力求共济”,“正因

^① 例如1946年10月17日《文汇报》报道,江苏江阴开始征兵后,有两名农民壮丁“不愿被抽,自行吊死”,还有一人“自断右手五指”。为此,有读者作《断指歌》“赋以哀之”。见《抽丁惨剧》,《文汇报》,1946年10月17日,第5版;复之:《断指歌》,《文汇报》,1946年10月26日,第6版。

^② 《本报民意测验参加者两万人》,《文汇报》,1946年10月21日,第3版。

^③ “Local Vernacular Conducts Poll Among Readers,” The China Press, October 24, 1946, p. 2;《文汇报时局测验发表》,《联合日报晚刊》,1946年10月23日,第4版;《文汇报民意测验结果揭晓》,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10月24日,第2版;《沪文汇报举行民意测验》,《解放日报》,1946年10月27日,第1版;温枫:《上海鳞爪·时事测验》,《前进报》,1946年11月2日,第2版;《民意测验》,临沂《大众日报》,1946年10月29日,第2版;《民意测验》,《胶东大众》1946年第45期,1946年11月15日,第2页。

^④ 《为人民想想》,《文汇报》,1946年10月24日,第2版。

^⑤ 《停战限期延长,平市咸感欣慰》,《时事新报》,1946年6月23日,第1版。

^⑥ 查惠民:《读者意见》,《华北日报》,1946年6月17日,第4版;《读者意见揭晓》,《华北日报》,1946年6月30日,第4版。

为一方面太好商量,给予了另一方面取巧投机的最好机会”。^①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10月初《文汇报》发起的时局问题测验可视为对国民党当局相关“民意测验”的有力反制与回击。此后,一系列类似测验相继举行,测验结果在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集中公布。10月中旬,香港工商界、文化界、妇女界等民主人士共同发动“港九各界响应美军撤离中国运动座谈会”。^②为呼应相关活动,10月21日,中共南方局主办的香港《华商报》辟出版面,亦开展“时局意见测验”。测验共设计了4个问题,同样针对美军驻华和国共内战,其中前两个问题如下:

问题一、你认为美军驻华影响会怎样?

- A. 对中国主权没有妨碍;
- B. 可以促进中国和平统一;
- C. 不仅破坏中国主权而且是干涉内政助长内战。

问题二、你对内战采什么态度?

- A. 赞成打,以武力来统一;
- B. 反对内战,要求先停战,恢复一月停战令的效力和实践政协决议;
- C. 打也好,和也好,没有意见。^③

这两个问题几乎是《文汇报》时局问题测验的翻版,而测验题后所附的6条简约更是仿效《文汇报》所定。这大致说明《文汇报》时局测验的效果得到了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认可与肯定。^④此次测验共有3747人参与,但只有不足10人在问题一中选择A或B,问题二选择A或C的人数加起来也不过56人,占比不足1.5%。^⑤《文汇报》评论道,这样的结果足以证明“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侨胞的心里是知道得很清楚的”。^⑥

紧接着,11月初,《文汇报》又在“读者的话”副刊用几乎2/3的版面、超过5000字的篇幅发布了针对妇女界时事测验的报告。最终结果,超过93%的参与者要求美军立即退出中国,亦有超过90%参与者认为内战是造成抗战胜利后人民生活仍然痛苦的主要原因。^⑦

无论是近两万人参与的《文汇报》时局问题测验,还是更有针对性的面向香港民众和上海妇女界的时事测验,结果并无二致,充分说明反内战和反美军驻华已经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民意和社会共识。这实现了岳虎最初的构想:“让《文汇报》的读者,先作个发言的先锋,然后推及全上海,以至整个中国的人民。”^⑧民意测验系统性地收集并汇聚起个人意见,运用统计方法进行量化分析,并以百分比的形式呈现民众的立场与态度。这样的做法不仅反映出中国民众的集体意愿,还以直观且

① 《我们要求一个结果!》,《华北日报》,1946年7月1日,第2版。

② 黄朗:《南国的吼声》,《文汇报》,1946年11月4日,第6版。

③ 《请读者热烈参加本报时局意见测验》,《华商报》,1946年10月21日,第4版。原题目以1、2、3指代各选项,为便利论述改为A、B、C。

④ 在上海《文汇报》被迫停刊后,徐铸成转而南下香港,他在创刊香港《文汇报》前曾拜访主持《华商报》的夏衍,夏衍表示,希望《文汇报》“以中间偏左姿态出现”,既可争取读者,也可作为《华商报》的第二线,根据需要可以“顶”上去。由此一例可见两报之间的关联性。见徐铸成《香港〈文汇报〉创刊初期——怀念潘汉年同志》,《报海旧闻》,第425—426页。

⑤ 《本报读者时局意见,测验结果揭晓了》,《华商报》,1946年11月4日,第2版。

⑥ 三雄:《香港的民意》,《文汇报》,1946年11月10日,第6版。

⑦ 《上海妇女界时事测验报告,二千四百个妇女对时局的意见》,《文汇报》,1946年11月3日,第8版。

⑧ 岳虎:《两大时局问题测验,请全国读者踊跃发言!》,《文汇报》,1946年10月7日,第6版。

具说服力的数据形式，向国内外发出正义的呼声。

10月18日，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等民间团体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为期三天的“中国及远东大会”，要求政府撤回驻华美军，“中止对蒋主席作经济支持及军火援助”。^①《文汇报》在报道中还援引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执行干事陆慕德(Maud Russell)的来信：“从中国方面能取得愈多的配合，争取和平的运动无疑地就愈是壮大。”^②因此，“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及以《文汇报》时局测验为代表的相关舆论宣传，既呼应了美国方面民主人士的行动，更进一步汇聚了中美两国和平力量的合力，进而共同推动一场跨国界的、反对美军驻华与支持中国和平的舆论浪潮。

作为直接关系方的美国政府，也感受到《文汇报》时局测验及“美军退出中国”运动的冲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编译的《中国新闻评论》(Chinese Press Review)，收录每日上海各大报纸新闻，《文汇报》是其主要来源之一。这一时期，《中国新闻评论》摘译了《文汇报》及“读者的话”刊载的揭露美军暴行、宣传“美军退出中国周”、呼吁国共停战等主题的文章。^③而在时局测验结果公布之日，《中国新闻评论》第一时间将两道测试题、各选项的最终结果翻译抄录，可见美方对此事件的关注。^④不仅如此，1946年10月17日，《文汇报》正如火如荼开展测验统计工作，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在致国务卿的报告中引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裴斐(Nathaniel Peffer)的备忘录，评论此时美国在华的尴尬处境：

美国在中国的道德威望正在丧失，甚至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怨恨。国民党及所谓反动派的支持者怨恨我们没有更加积极地帮助他们打击共产党以及隐含的苏联；商界、知识界，以及公务员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对我们给予政府的支持感到不满，因为我们给予的支持仅让政府相信它可以为所欲为而无需承担后果，却没有施加足够的压力来促使它改变精神和做法；激进但非共产主义者认为我们的支持既使内战成为可能，又扶持了最糟糕的政权；极左派则怨恨我们，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正在帮助一个法西斯政权，而这个政权不过是我们为了实现帝国主义目的的工具。^⑤

司徒雷登认为，上述观点并非杞人忧天，而是一个及时的警告。中国共产党与国内民主人士在“美军退出中国”等运动中所掀起的抗议浪潮，使美国方面感受到一定的舆论压力，促使其重新审视在华行动的道德与政治困境。进一步来说，《文汇报》时局测验及相关运动，不仅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利用舆论争取国际影响力方面的成功，还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中国民众的诉求传递至国际社会，并对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⑥

^① 《中国及远东大会，昨在旧金山开幕》，《文汇报》，1946年10月19日，第2版。

^② 踪燕：《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文汇报》，1946年10月21日，第2版。有关陆慕德在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期间的生平，可见Karen Garner, *Precious Fire: Maud Russell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3), pp. 185–207.

^③ 例如 Let Us Think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U. S. , September 24, 1946, Chinese Press Review,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Shanghai, China, No. 159, Library of Congress, Records of the U. S. Information Service in China: Chinese Press Reviews and Summaries, 1944 – 1950, Reel 3。该文原为1946年9月24日《文汇报》第2版的“社评”《为美国设想》。

^④ Results of Wen Hui Pao Public Opinion Test, October 23, 1946, Chinese Press Review,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Shanghai, China, No. 183, Library of Congress, Records of the U. S. Information Service in China: Chinese Press Reviews and Summaries, 1944 – 1950, Reel 4.

^⑤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17, 194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46, *The Far East: China*, Vol. 10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pp. 387 – 390.

^⑥ 参见邹谠著，王宁、周先进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尤其是第十章和第十一章。

结语

《文汇报》副刊“读者的话”的时局问题测验，不仅是一次民意调查，更是一场旨在汇聚民意的爱国动员活动。测验的发起，响应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内民主人士的号召。在测验过程中，近两万名参与者自身的主张经由《文汇报》这一载体以民意测验统计数字的形式得以汇聚和彰显，不仅巩固了反内战与反美军驻华的力量，而且对国民党当局的相关舆论宣传做出了有力反击，同时向美国方面传递了中国民众不可忽视的正义呼声。因此，时局测验因应“美军退出中国”运动而生，但反过来，它也成为“美军退出中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文汇报》而言，其影响力与日俱增。在“美军退出中国”运动高潮期的1946年9月和10月，《文汇报》日均发行量突破4万份，较8月提升1倍，较年初提升近4倍。当年年底，日均发行量更是逼近5万份之多，外埠读者比例超过40%。^①还有报道称，1947年初，北京大学学生公开质问校长胡适，“图书馆内为何不订如文汇一类报纸？”^②这显示出《文汇报》在“美军退出中国”与国共内战等重大议题上的新闻立场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认可，尤其在青年学生群体中，这更进一步说明《文汇报》所发起的时局问题测验真正彰显出民心所向。

《文汇报》的时局测验与反内战舆论宣传，虽未能阻止国共内战进一步扩大化，却成功汇聚和巩固了全国范围内反内战的力量。反美军驻华的宣传更是激发全社会的广泛共鸣，两个多月后发生的沈崇事件则成为导火索，将积聚的民意彻底点燃，最终形成全国性、多阶层参与的抗暴运动。驻华美军在中国各地引发的一系列暴力事件，加上国民党当局对中国共产党及国内民主人士争取和平呼声的漠视，使得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对国民党失望乃至反感。^③国民党依靠美方进行内战的策略，使其走向了民众的对立面，彻底失去民心。

(责任编辑：潘晓霞)

^① 《文汇报增资计划书·每月发行数量统计图》(约1946年12月)，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联合征信所档案，Q78-2-15742；《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工矿事业调查表》(1946年12月3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联合征信所档案，Q78-2-15742；《联合征信所调查报告书》(1946年12月3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联合征信所档案，Q78-2-15742。

^② 《向导女受辱自杀，胡适之不管订报》，《新民晚报》，1947年4月11日，第1版。

^③ 胡素珊(Suzanne Pepper)指出，1945—1949年多次发生的学生抗议运动，其本质是反战运动。然而国民党当局一次次采取粗暴镇压的方式应对，将自己“推到了学生的对立面”，“甚至把很多学生送到了共产党的阵营”，致使学生对政府的反对逐步鲜明。参见胡素珊著，启蒙编译所译《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38—40页。

significant challenge in China. The Ming Sung Umbrella Factory case serves as a prime example. In this case, Chinese and foreign businessmen became embroiled in a heated dispute over the issue. At the heart of the case was the conflict between two legal principles: the Pro-Rata Liability principle, upheld by joint venture norms, and the Joint Liability principle, established by the Da Li Yuan's ruling. The central question was which legal principle should take precedence. Ultimately, the Da Li Yuan confirmed the primacy of the Pro-Rata Liability principle through a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This case underscored the dual challenges facing joint venture norms in the 1920s. Internally, the shifting dynamics within joint ventures disrupted the delicate balance of risk-sharing between partners and creditors. Externally, these norms came under increasing pressure from a transforming legal system, judicial reforms, and emerging economic forces. In response to these challenges, Chinese merchant elites strongly defended joint venture norms. Analyzing their stance reveals the tension between traditional local business practices and the evolving commercial and legal frameworks of the time, providing valuable insight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odern commercial system.

Unraveling the Aggregation of Public Opinion: A Study of the 1946 Domestic Survey Conducted by Shanghai's *Wen Wei Po* Chen Yuhan (130)

In October 1946, the Readers' Voices supplement of Shanghai's *Wen Wei Po* conducted a public opinion poll on the presence of U. S. troops in China and the ongoing civil war, attracting nearly 20,000 participants. The results revealed strong public sentiment: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respondents called for the withdrawal of U. S. troops and the cessation of the civil war. Several factors, including *Wen Wei Po*'s prior promotional efforts for this survey, its longstanding political leanings,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questionnaire and answer options, helped explain the poll's outcome. The poll's outcome strengthened the forces opposing both the U. S. military presence and the civil war, placing significant pressure on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public opinion. In a volatile and rapidly changing political environment, both the Kuomintang (KMT)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sought to leverage public opinion polls to their advantage in the struggle for dominance, positioning themselves as the true representatives of popular sentiment while rallying public support. This contestation was not only a continuation of political jockeying between the KMT and CPC, but also highlighted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public opinion and its political significance in China at the time.

A Study of the Newly Discovered Copy of Yuan Chang's Diary and the Authenticity of Two Widely Used Gengzi Diaries Zhu Jiaying (145)

As China's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at the time, Yuan Chang personally experienced the Boxer Rebellion and its aftermath. His *Luanzhong riji can'gao* (Uncompleted Copy of the Diary in Chaos) and *Yuan Jingqing riji* (Diary of Yuan Jingqing) are key documents for studying this period of history. However, both diaries are incomplete and have undergone significant deletions and revisions, which obscure the true events of some historical occurrences. In fact, both diaries share a common source: *Ouyi Diary*, preserved at the Zhejiang Provincial Museum. This version is the closest to the original form of Yuan Chang's diary, and its discovery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to unravel many historical mysteries.